

# 孙子兵法新注

西安陆军学院翻印

一九八六年五月



# 孙子兵法新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

中 华 书 局

1977年·北京

# 略谈《孙子》

《孙子》又称《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军事名著，产生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据史书记载，它是我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所著。孙武为春秋末期齐国人，其生卒年月不可考，约与孔丘同时期，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他从齐国出奔到南方的吴国，经吴王重臣伍子胥的推荐，吴王阖庐知他善于用兵，便重用为将。他同伍子胥辅助吴王经国治军，对于吴国的崛起，“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起过重要作用。

《孙子》一书，总结了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两种军事思想的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作。它问世后，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哲学史上也占有相当地位。早在战国时期，《孙子》就广为流传。韩非在《五蠹篇》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战国军事名著《吴子》、《孙臆兵法》、《尉缭子》等就引用并发挥了《孙子》的若干军事思想。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墓葬中，发现迄今最早的竹简《孙子》等大量兵书残简，说明西汉时《孙子》流传也是很广的。三国著名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曹操集·孙子序》），并对《孙子》作了注释。唐太宗李世民同其名将李靖问对兵法时，十分赞赏《孙子》，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李卫公问对》）。总之，从战国以来，《孙子》为历来军事家所重视和推崇。在国外，《孙子》也影响颇大，早就有日、英、法、德、俄等文译本流传于世。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遵照毛主席的这些教导，为了批判地吸取历史上军事斗争的经验，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我们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孙子》作初步的探讨和注释，以期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热忱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孙子》全书共十三篇，论述了“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孙武揭示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有些至今仍有其科学价值。现简介如下。

### 一、提出了以“道”为首的战争制胜条件

对战争和制胜条件的看法，在社会制度大变革、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孙子》开宗明义就说：用兵打仗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是不可不认真研究考察的，所以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即必须从“五事”和“七计”等客观实际出发，分析、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以探求战争胜负的可能性。所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所谓“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个方面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于战争双方并关系到战争胜败的东西。由此可见，孙武对战争胜负的认识，属于早

期战争问题上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同当时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所鼓吹的“军旅有礼，故武功成”（《礼记·仲尼燕居》）、“有礼无败”（《左传·哀公十四年》）等唯心主义的谬论，是根本对立的。

孙武所论述的制胜条件，触及了战争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五事”、“七计”，包括了“民”对战争的态度，天时地利，将领的指挥能力，军队的组织、制度、训练程度、战斗力的强弱，以及赏罚和纪律等等方面。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孙武在论述“五事”、“七计”时，把“令民与上同意”的“道”这个属于政治范畴的重要条件放在首位，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朴素地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这对于二千多年前的古人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孙武重视“民”的作用，从山东临沂出土的汉墓竹简《吴问》中也可得到印证。《吴问》记述了孙武同吴王关于晋国六将军“孰先亡”、“孰固成”的问对，孙武从范、中行、智、韩、魏、赵六家新兴封建主所施行田亩制的大小和赋税轻重不同，说明亩大、税轻者为“厚爱其民”，可以“固成”。当然，孙武所说的“令民与上同意”的“道”，是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道”；是属于他那个阶级的政治。

## 二、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普遍军事规律

孙武在历史上第一次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概括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指导规律，这是前无古人的，是《孙子》军事思想的精华。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这一思想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论持久战》）毛主席的评价，为我们探索《孙子》精华指明

了正确的途径。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军事名言，不仅揭示了战争指导者对彼己情况的了解与战争胜负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指明了在了解彼己情况的基础上，找出双方行动的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确定自己的作战行动，以战胜敌人。这就把“知”与“战”，把“胜可知”与“胜可为”结合了起来，把认识和运用规律结合了起来。这是孙武对我国军事思想的一大贡献。

孙武揭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普遍军事规律时，还对“知”与“战”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如他把了解敌情提到“三军之所恃而动”的重要地位，用专篇论述了使用间谍掌握敌国情况的问题；提出了许多作战行动中侦察判断敌情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在各种敌情、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动的原则等。在知己方面，提出了“上下同欲”、“识众寡之用”、“以虞待不虞”、“知吾卒之可以击”与“不可以击”等等。他要求将帅考虑问题要“杂于利害”，见利思害，居害见利，力求全面；同时，要“因利而制权”，把握有利战机，正确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

孙武运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普遍军事规律，在了解当时各诸侯国情况的基础上，从战争经验中总结出了若干有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如“先胜而后求战”，“示形”、“动敌”，“我专而敌分”，“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等等。

“先胜而后求战”，就是在了解彼己强弱胜负之情的基础上，有充分的应敌准备，“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有把握取胜而后求战。反对那种即不作周密考虑和准备而又盲目轻敌的“先战而后求胜”的错误做法。这一思想，是稳妥而积极的。

“示形”、“动敌”，就是用“示形”的方法，用“诡道”诱骗和调动敌人；同时，注意不为敌人所调动，即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使作战的自由权稳操于自己手中，迫敌处处陷入被

动，以便“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这一原则，是有其重要价值的。

“我专而敌分”，就是作战中要造成“以镒称铢”、“以毁投卵”的兵力优势，使“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从而达到“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的目的。孙武这个“我专而敌分”的原则，为历来军事家所赞赏，曾给予很高评价。

“避实而击虚”，就是从了解、分析敌我情况中，找出敌人的虚实所在，避开敌人力量坚实之处，打击其虚弱之点，“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达到“攻而必取”的目的。

“因敌而制胜”就是要求随时随地了解变化不定的敌我双方情况，并针对当面的敌情，灵活地变换自己的战法，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一原则，反映了孙武主张战争指导上的灵活性，反对一成不变的机械观点。这种思想，在《孙子》中体现得比较充分，例如：它强调要根据不同敌人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如“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之类；根据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战法，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等等；另外还要求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这在《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中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在《九变篇》中所提到的“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则包含着更大的灵活性，要求将帅要懂得临机处置的重要。总之，孙武认为，战争中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必须在作战指导上做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充分发挥将帅的指导能力，灵活机动地战胜敌人。

### 三、反映了较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

《孙子》之所以能够提出若干较精辟的军事理论原则，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的。从《孙子》十三篇中不难看出，孙武在论述兵法的过程中，反映出不少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如他在分析研究战争、判断战争胜负可能性时，能够从一些客观条

件入手，并较充分地估计到了战争对客观条件的依赖关系。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对于“道”和“天”的解释是朴素唯物论的。《孙子》中的“道”，不是虚无不可捉摸的超时空的东西，而是指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是“令民与上同意”等客观实际。《孙子》中的“天”，不是什么神物，而是“阴阳、寒暑、时制”等自然现象。他还认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充分表明，孙武对于了解敌情，即不信鬼神和“天命”，也不用历史事件去类比和推论，而是从真正了解敌情的人取得。这种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同当时孔丘等所鼓吹的“畏天命”、“敬鬼神”等唯心论的说教，是针锋相对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矛盾论》）。孙武在探讨战争规律的过程中，也表现了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特点。他直观地看到了关于敌我、攻守、胜败、虚实、奇正等一系列对立现象，并要求人们在战争活动中要注意对立着的两个方面的情况。如了解情况时要“知彼知己”，考虑问题时要“杂于利害”，军争时要估计到“利”与“危”，等等。对于“治乱”、“勇怯”、“强弱”、“劳逸”、“饥饱”等等矛盾着的现象，孙武朴素地认识到它们是可以变化的，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逸而劳之，饱而饥之，安而动之”，等等。在认识自然现象时，他看到了天地、日月、江河、四季的不断运动，并用自然现象的变化无穷来比喻用兵方法的灵活多样。这种思维方法，也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当然，孙武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是粗浅的，甚至认为只是周而复始，不断重复，因而没有脱出“循环论”的窠臼。

《孙子》一书所论述的军事问题及其反映的哲学思想，虽然



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但由于它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代的产物，所反映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思想，这就不能不带有剥削阶级的烙印，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对此，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批判。

孙武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毕竟仍是剥削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存在着阶级对立和根本的利害冲突。这种阶级矛盾也必然在军队内部关系和作战指导思想中反映出来。从《孙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士卒被迫出征打仗，将帅们因害怕士卒逃亡，主张深入到敌国“重地”去作战；为了驱使士卒拼命作战，玩弄种种剥削阶级的手段，主张“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登高而去其梯”等等；将帅们不敢将真情告诉士卒，于是采用愚兵政策，如“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犯之以利，勿告以害”等等，以此来达到其指挥士卒“若驱群羊”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剥削阶级阶级本性的反映。

孙武所论述到的作战指导原则，有些问题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如他过分地强调速胜，说什么“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就太绝对了。一般地说，在战争问题上，无不要求速胜，但是，就进步战争而言，在一定条件下，战略上采取持久作战的方针，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在战争指导问题上，孙武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者也”，这是片面的。在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情况下，历史上有不战而迫使对方屈服的事例；但这也只是剥削阶级间战争的个别现象。当敌对双方的矛盾已发展到非战争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还寄希望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甚至把它作为一条普遍的指导原则，则是一种不符合战争实际的唯心思想。孙武笼统地提出“归师勿遏”、“穷寇勿迫”等等，也是片面的。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孙武军事思想中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也反映了他在某些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

孙武论述了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了反映新兴地主阶级政治要求的选将条件，这比之奴隶主阶级的“世卿世禄”固然是一个进步；但孙武过分地强调和夸大将帅的个人作用，说什么“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并把殷朝、周朝的兴起，归之于伊挚、吕牙这两个所谓“上智”人物的作用，这显然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表现。

尽管如此，《孙子》仍不失为我国古代最有价值的著名军事典籍。“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孙子》是反映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大变革时期新兴封建生产关系的军事著作。历史证明，凡属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阶级，因为它要改变已经腐朽了的旧制度，总是比较能够正视现实，具有一定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要求革新和进步。而一切腐朽没落的阶级，由于它们竭力维护旧制度，政治上总是倒行逆施，反对任何革新和前进，因而其军事思想，也必然是保守的、反动的、主观唯心的。

# 说 明

(一) 本书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进行注释。凡与其它版本以及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有重要出入之处，则在有关的注释中加以注明，供读者参考。

(二) 本书注释办法：每篇篇题之下，均有简明内容提要；根据原文意思分段标点；难懂的字、词、句分别加以注释，并尽可能注明根据；每段均有译文，称为“大意”；每篇之后有“简评”，对各篇内容有重点地进行简要评述。原文一般采用简化汉字，个别容易产生歧义的字，仍保留繁体。

(三) 对《孙子兵法》中历来有不同理解的某些重要词句，采取几说并存的办法，但“大意”中则主要根据我们的理解作了语译。

(四) 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在注释中选用了若干有关的中国古代战例。

在注释过程中，曾得到工厂、部队和有关专业单位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在此表示深切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注释中可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 目 录

略谈《孙子》	( 1 )
说 明	( 9 )
计 篇	( 1 )
作战篇	( 9 )
谋攻篇	( 15 )
形 篇	( 22 )
势 篇	( 28 )
虚实篇	( 35 )
军争篇	( 43 )
九变篇	( 51 )
行军篇	( 59 )
地形篇	( 68 )
九地篇	( 72 )
火攻篇	( 87 )
用间篇	( 92 )

# 计 篇

本篇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并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军事名言。

孙子曰：兵<sup>①</sup>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sup>②</sup>也。

①兵：兵器、兵士、军队、战争等。这里指战争。

②察：考察、研究。

【大意】 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生死存亡，是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的。

故经之以五事<sup>①</sup>，校之以计而索其情<sup>②</sup>：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sup>③</sup>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sup>④</sup>天者，阴阳、寒暑、时制<sup>⑤</sup>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sup>⑥</sup>也。将者，智、信、仁、勇、严<sup>⑦</sup>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sup>⑧</sup>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sup>⑨</sup>，知<sup>⑩</sup>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sup>⑪</sup>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①经之以五事：指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战争胜负的可能性。经，量度，这里是分析研究的意思。

- ②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从中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校（jiao较），通“较”，比较；计，这里指“主孰有道”等“七计”。
- ③令民与上同意：使民众与国君意愿相一致。《荀子·议兵》：“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也认为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取得民众的支持。
- ④不畏危：不害怕危险。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以下简称汉简《孙子兵法》）此句为：“民弗诡也。”
- ⑤阴阳、寒暑、时制：阴阳，指昼夜、晴雨等天时气象的变化。寒暑，指寒冷、炎热等气温的不同。时制，指四季时令的更替等。
- ⑥远近、险易、广狭、死生：这里指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阻或平坦、作战地域的宽广或狭窄、地形是否利于攻守进退。汉简《孙子兵法》云，此句为：“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多“高下”二字。
- ⑦智、信、仁、勇、严：这里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等条件。
- ⑧曲制、官道、主用：曲制，指军队组织编制等方面的制度。官道，指各级将吏的职责区分、统辖管理等制度。主用，指军需物资、军用器械、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制度。主，掌管；用，物资费用。
- ⑨闻：知道、了解。
- ⑩知：知晓，这里含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的意思。
- ⑪孰：谁，这里指哪一方。

【大意】 所以，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所谓“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为君国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所谓

“天”，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炎热、四季更替。所谓“地”，是指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阻或平坦，作战地域的宽广或狭窄，地形是否利于攻守进退。所谓“将”，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所谓“法”，是指军队组织编制、将吏的统辖管理和职责区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等制度规定。以上五个方面，将帅们没有不知道的；然而，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的才能打胜仗，否则，就不能取胜。因此要从以下七个方面来分析比较，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就是说：哪一方的国君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有才能？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实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强盛？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我们根据以上分析对比，就可以判明谁胜谁负了。

将听吾计<sup>①</sup>，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①将听吾计：一说，“将”作为“听”的助动词解，这样意为：如果能听从我的计谋。另一说，“将”指一般的将领，这样意为：将领们能听从我的计谋。

【大意】 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一定胜利，我就留下；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一定失败，我就离去。

计利以听<sup>①</sup>，乃为之势，以佐<sup>②</sup>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sup>③</sup>也。

①计利以听：指有利的计策已被采纳。计，计策，这里指战争决策；以，通“已”；听，听从、采纳。

②佐：辅助。

③因利而制权：即根据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行动，也就是说，怎么对我有利就怎么行动。制权，即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行动。

【大意】有利的计策已被采纳，还要设法造“势”，以辅助作战的进行。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兵者，诡道也<sup>①</sup>。故能而示之不能<sup>②</sup>，用而示之不用<sup>③</sup>，近而示之远<sup>④</sup>，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sup>⑤</sup>，乱而取之<sup>⑥</sup>，实而备之，强而避之<sup>⑦</sup>，怒而挠之<sup>⑧</sup>，卑而骄之<sup>⑨</sup>，佚而劳之<sup>⑩</sup>，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sup>⑪</sup>，不可先传<sup>⑫</sup>也。

①兵者，诡道也：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行为。诡，诡诈、奇诡。曹操注：“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

②能而示之不能：意即本来能攻，故意装作不能攻；本来能守，故意装作不能守，等等。示，示形，这里是伪装的意思。

③用而示之不用：本来要打，故意装作不打；本来要用某人，故意装作不用他，等等。例如，公元219年，吴将吕蒙想乘蜀将关羽北攻樊城之机，夺取荆州。由于关羽对吕蒙有所戒备，仍留有重兵把守江陵、公安等地。吕蒙为了麻痹关羽，假称病重，孙权公开把他召回建业（今南京），并以“未有远名，非羽所忌”的陆逊来代替，以掩饰其夺取荆州的意图。后关羽果然放松了对荆州的防守，从江陵、公安调兵进攻樊城，吕蒙便乘机沿江而上，指挥吴军夺取了公安、江陵等地，很快攻取了荆州。

④近而示之远：本来要从近处进攻，故意装作要从远处进



攻：本来马上进攻，故意装作不马上进攻，等等。例如，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率军大举攻吴，吴王夫差率军迎击，双方于笠泽（今江苏苏州东南吴淞江）夹水对阵。越军决定从当面渡江攻击，但为了隐蔽企图，故意派出小股部队从距敌较远的左右两侧利用夜暗鸣鼓佯渡。夫差受骗，分兵迎战。越军主力便乘机渡江，出其不意地实施正面突击，大败吴军。

- ⑤乱而取之：对于处于混乱状态的敌人，要乘机攻取它。例如，公元383年，东晋军于洛涧（今安徽怀远南）大败前秦军，迫使秦军沿淝水西岸布阵，晋将谢玄利用秦主苻坚骄傲的心理，声称愿意渡河与秦军决一胜负，要求秦军先后退一步。苻坚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诱使晋军渡河，乘其半渡而击之，于是命令部队稍向后退，但一退不可遏止，造成阵势混乱，晋军乘机抢渡淝水，大败秦军。
- ⑥强而避之：对于强大的敌人，要暂时避开它。例如，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为平定七王之乱，派周亚夫率军东攻吴、楚。周亚夫见吴楚联军兵势强盛，难与争锋，采取了“以梁委之，绝其粮道”的谋略。于是进据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避而不战，听任吴楚联军进攻梁军，以便利用梁地（今河南东部）拖住敌方。后进至下邑（今安徽碭山东），仍深沟高垒，坚壁固守。等到吴楚联军饥疲不堪而不得不撤退时，周亚夫才率军乘势追击，大破吴楚联军。
- ⑦怒而挠之：挠，挑逗。这句是指对于易怒的敌将，要用挑逗的办法激怒他，使其失却理智，轻举妄动。例如，公元前203年，汉军乘项羽东攻彭越之机，围攻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楚将曹咎起先按照项羽“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的告戒，坚守不出。后来由于汉军连续挑战和辱骂，曹咎一怒之下，便率部出击。汉军趁楚军半渡汜水时发起进攻，取得很大胜利。